

我國跨國政策學習的經驗與挑戰： 政策學習研究之再啓航

蘇偉業*

壹、專刊背景

在我國政策制定過程中，「借鑒」或「參考」外國經驗是政府機關的日常標準作業程序。政府的研究委託案一般都要求受委託的研究者蒐集報告一下其他國家的相關政策或制度經驗。當 1990 年代西方才出現政策學習研究領域時，這政策學習實踐在戰後的時代甚至更早的年代就是我國政府機關的日常，但我們對這學習過程及其成效之研究卻付之闕如。直到上述西方政策學習研究與理論出現後，我國相關研究也隨之湧現。然而，西方政策學習研究之出現是有其自身脈絡，特別是對全球化現象的因應，以及呼應循證公共政策制定（evidence-based policy making）之倡導（Evans, 2004; Rose, 2005）。相對地，對我國以至其他後進國家而言，向西方學習或向先進國家學習本身就是一項老命題，不過學術上過去以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現代化（modernization）來標籤而已，且非以公共政策角度作為關注切入點。

無論如何，西方相關政策學習概念提供了我們一個新的視野，但同時也縮限了我們視野。我們普遍採用西方學術界提出的政策移植（policy transfer）及政策擴散（policy diffusion）分析一直框限我們的目光與理論依據，但政策移植與擴散理論不一定能有效及完全反映現實，回應我們的真正關懷、需求與所面對的問題。故

* 蘇偉業（專刊主編）為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email: bennisso@nccu.edu.tw

此，本專刊以跨國政策學習（cross-national policy learning）作為命題，正是要超越既有框架。這一方面是擴大而非放棄政策移植與擴散的理論；另一方面是將重點放在政策學習本身。

因應以上理由，本專刊主編在 2020 年 11 月 21 日首次舉辦針對東亞國家向西方政策學習的國際工作坊（名為：Workshop on policy learning in East Asia），最終有 3 篇在工作坊發表的論文刊登在國際期刊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Fu, 2023; Low, 2023; Lai, 2024）。而本專刊則是源自於針對我國跨國政策學習的工作坊。該工作坊是在 2023 年 9 月 16 日於臺灣公共行政與公共事務系所聯合會年會中舉行。本專刊主編結集了多位國內學者（含博士生），其研究議題可涉及跨國政策學習範疇，工作坊嘗試導入一些新近政策學習相關理論，以「如何學習」作為主題，從政策學習角度重塑他們專長的議題。經工作坊的密集交流，及經多個月的調整修正後，論文正式送交本刊進行外審，最後有 4 篇論文通過雙向匿名審查，並經修正後於本次專刊發表。

本導論在簡介這 4 篇論文的內容與貢獻前，會先對傳統政策移植與擴散研究進行批判性的回顧，作為本專刊學術議題的背景引言，並導引出一些近年出現但被我國學術研究所忽視的概念與新角度，繼而提出我國跨國政策學習的新研究議程，以及我國在跨國政策學習所面臨的挑戰。在本專刊發表之論文已涵蓋了議程中的部分項目，但仍有一些項目尚待開發，包含本專刊最後 1 篇書評所檢視的政策學習與政策失敗關係之議題。本文藉此機會為我國政策學習研究之再啟航進行導航。

貳、傳統政策移植與擴散的焦點與侷限

西方跨國政策學習的相關研究議題在 1990 年代前就出現，其中最具影響力的是 Hugh Hecllo（1974）提出不同於傳統政治學所理解的權力衝突決定政策的角色，認為當面對不確定性（uncertainty）的情況下，「學習」才是重點。不過，真正揭開有系統地投入這議題的序幕是 1991 年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專刊（11 卷 1 期），其發表了一系列的跨國政策學習論文。其後，Bennett 與 Howlett（1992）的後設分析首次將分散在政治學內不同領域的相關文獻進行整理，並歸納以誰學習（who learns）、學習什麼（learn what）及學習效果（to what effect）來分析政策學習。該文對我國引進相關研究概念極為重要，因為 6 年後，吳定（1998）以該文涵蓋的文獻範圍作為藍本，向我國讀者介引政策學習概念。之後，相關的討論與研究就開始

在國內湧現。

上述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專刊及 Bennett 與 Howlett (1992) 的後設分析皆涵蓋一篇跨國政策學習的關鍵論文，就是 Richard Rose (1991) 的教訓汲取 (lesson drawing)。Rose 的教訓汲取可說代表著西方跨國政策學習理論建構之起點。教訓汲取就是從別處的現成經驗中汲取可利用的教訓來設計自己的政策。教訓汲取的精髓就是：在全球化趨勢下，各國皆面對類似的公共問題，而別人的成功經驗就是自身解決當下公共問題的最佳循證依據，也是解決問題的最佳捷徑。

有趣地，縱然教訓汲取的標誌性，但後續發展卻被政策移植研究所掩蓋，並代表了跨國政策學習研究的主流。的確，排除避免重蹈他國的覆轍之負面教訓汲取 (negative lesson drawing)，與受國外政策經驗刺激啟發 (inspiration) 而另行設計國外沒有的政策計畫外，教訓汲取理念的核心重點就是政策移植 (Rose, 1991)。政策移植的理論奠基者 Dolowitz 與 Marsh (1996, 2000) 就延伸教訓汲取理論，認為教訓汲取僅及「自願性移植」(voluntary transfer)，而政策移植則進一步包含不同程度的非自願「強制性移植」(coercive transfer)，政策移植概念比教訓汲取更具涵蓋性。雖然政策移植延伸了政策學習或教訓汲取之討論，但其更強調學習帶來的行動後果，偏向一種行動導向且具意圖的學習 (action-oriented intentional learning)，即將行動與政策變遷作為學習的反映 (Evans, 2009)。

值得注意的是，教訓汲取／政策移植研究之出現部分是源於對早在 1960 年代就在美國出現的政策擴散 (policy diffusion) 研究的批判。政策移植與擴散常被聯繫到政策學習，但政策擴散研究原本並不涉及學習。政策擴散所關心的是創新政策在美國各州之間的擴散模式 (Walker, 1969; Eyestone, 1977)，其關心的是一項新政策如何持續地及順著某原則從一個地方擴散到另一個地方，嘗試發現擴散的客觀結構與規律。Rose (1991) 與另一位政策移植研究者 Wolman (1992) 皆認為，政策擴散研究忽略了政策之轉移可源自於學習所帶來。Rose (1991, p. 9) 更批評政策擴散只將擴散現象視為一種技術性的決定論 (technocratic determinism)，沒有任何自願性的教訓汲取。教訓汲取或政策移植應代表著一個可變化多端的過程，中間存在很多主觀因素，非完全由客觀因素決定政策之轉移。

不過，後來以美國為本的政策擴散研究在擴大到跨國性分析時，開始與政策移植合流。政策擴散研究學者開始將政策學習視為政策擴散的因素。Weyland (2004) 所編的論文集就分析自願性學習對拉丁美洲各類社會政策改革擴散之影響，而 Meseguer (2005) 就分析指出 1980-90 年代全球性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擴

散存在著自願性的學習。

弔詭的是，不論政策移植或政策擴散，學習僅是兩者自變項之一（Marsh & Sharman, 2009; Kuhlmann, 2021），其並非學習本身，而是學習的可能結果。這也間接表明，政策學習不必然帶來移植或擴散，或非學習因素也能帶來移植或擴散。有學習而沒有或不完整地移植也不代表政策失敗，甚至可能出現將不成功的經驗成功移植，反映不良的學習（Stone, 2017）。誠然，政策移植或擴散研究並沒有認真討論「學習」本身。就算 Bennett 與 Howlett（1992）討論政策學習研究的變項時，也沒有提及「如何學習」（how to learn）。西方政策學習及移植研究出現初期，任何受他國影響採用某對應政策皆可籠統理解為一種學習。然而，受他國影響的模仿（mimicry）與抄襲行為可以是不經評估分析之結果，就被一些學者認為不算是真正的學習（May, 1992; Heikkila & Gerlak, 2013）。Rose（1993）也承認，教訓汲取並非討論「如何學習」，而僅是討論「學到了什麼」，即學習的產出。這個「學到了什麼」並不排除純粹模仿或抄襲。Dolowitz（2009）後來也承認，政策移植研究不太對學習本身有所著墨，或隱含假設政策移植是基於理性學習的結果。

除了並非是學習本身與不必然涉及學習，政策移植與擴散另一個侷限是其「供應導向」的偏見。政策移植或擴散的出發點是一項可輸出的現成政策、政策工具或制度，輸入者是被動學習。但政策學習不必然先有可供輸出的完整政策，然後才能學習。學習者也可以先有問題，甚至有自定的問題框架或定義，再搜尋可學習之標的物（包含國外政策之元素）幫助政策構思，即「需求導向」的學習，這更可能反映真實的狀況。教訓汲取的理念原本也是相對從學習者角度出發，尋找面對共同問題且有解決方案的地方進行學習及移植方案。然而，這角度仍假設兩地有相同或類似的問題，然後其中一方有現成有效的問題解決方案，另一方進行評估與移植。這仍逃不過「供應導向」的假設。

承上，如果學習者面對一些自身的特殊問題，國外並沒有現成可移植的直接解決方案時，我們是否就不會向外國學習呢？我國的經驗顯示，機關的工作日常仍會向國外取經。例如我國面對特殊的戶籍「人籍不合一」問題，¹ 主管機關的研究報告仍大量蒐集其他國家的做法（不一定具有對應性的）（陳明敏等人，2017）。而中國大陸過去在深圳市試驗的行政三分制改革，就是因應自身的特殊需求，並自訂

¹ 「人籍不合一」是指國民並非住在戶籍所在地，可能是基於國民遷戶而沒有搬遷居住地，也可能是搬遷居住地而沒有遷戶。

問題框架，但卻聲稱學習了西方經驗（的確有到國外考察）。但實質上，西方並沒有對應的問題與經驗，其取經的標的是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代理機構化」（agencification）改革。中國學習者將西方經驗作了新解讀，並重新包裝成自己獨有的東西（蘇偉業，2017）。政策「借鑒」或「參考」很多時候都不是簡單地移植某一政策，而是將政策知識進行轉化運用。這在在顯示，「供應導向」的政策移植與擴散並不能有效涵蓋跨國政策學習之所有面向。

參、超越政策移植與擴散的跨國政策學習視野

西方相關學術討論近年已補正傳統政策移植與擴散的觀點。自 21 世紀初起，開始有討論以建構主義（constructionist）觀點來批評傳統政策移植與擴散理論。後者隱含假設政策會以成品的模式（finished form）存在於某地方供我們直接採用，但建構主義認為，政策學習應是一連串溝通下的產物，學習的結果是孕育（generated）出來的，不是散播而來的（disseminated）（Freeman, 2006, p. 379）。這現象常被理解為一種「政策轉譯」（policy translation）的過程。

Johnson 與 Hagström（2005）首次以轉譯概念解釋美國美沙酮（methadone）戒毒方法擴散到瑞典的政策變異，其借用知識社會學對擴散與轉譯之不同理解（Latour, 1986），指出被仿效的政策會在不同時間與空間下被重新解讀及建構。Lendvai 與 Stubbs（2007）進一步認為跨國政策轉移本身並不是移植，而是轉譯，因為政策制定本身就是一種意義的創造（meaning-making）。政策移植過程應該被視作為一個不斷改造、協商、法規制定的過程，是一個灌注政治的脫位（dislocation）與移位（displacement）過程，從不匹配變成匹配（unfit to fit）（Lendvai & Stubbs, 2007, p. 180）。

隨後，在 2010 年代就有不少政策移植研究之論文以政策轉譯作為分析途徑（Mukhtarov, 2014; Park et al., 2014; Minkman & van Buuren, 2019; Hasan et al., 2020）。當中，Mukhtarov（2014, p. 76）更將政策移植與政策轉譯完全區分開來，認為政策轉譯是「修飾政策理念的過程，其並在政策理念跨域移轉過程中建立新意涵與設計」。引用 Lendvai 與 Stubbs（2007）的看法，Mukhtarov（2014）認為政策移植是找尋匹配之處將政策植入；政策傳譯則是將不匹配變成匹配，透過傳譯創造匹配。

另一個批判來自地理學的觀點。地理學者的關懷是政策與空間的關係，這正好

是跨國政策學習的範疇。在分析一些跨都會政策學習的個案中，他們開始認為全球政策知識流動是複雜多變且充滿權力的過程，並非簡單直接的從 A 點到 B 點之物理移動 (McCann, 2008, 2011; Cook & Ward, 2011)。他們以都會政策流動 (urban policy mobilities) 概念替代政策移植觀念來檢視全球政策空間流動現象，主張所謂後政策移植的研究途徑 (post-transfer approach) (McCann & Ward, 2013)。他們同樣採用建構主義的觀點，認為政策從 A 點到 B 點的移動過程中，政策會被重新在地化組裝，包括文字、行動者、機構、制度及網絡在內 (Prince, 2010; Peck, 2011)，這過程稱之為政策組裝 (policy assemblage)。

政策在移動與組裝過程後會產生變異。政策在新地方被採用時，其不僅被重模 (remoulded)，其於穿越該流動過程時也會被重塑 (reshaped)。各式各樣的行動者在這流動途中會對政策作出解讀 (interpretation) 及再解讀 (reinterpretation) (McCann & Ward, 2013, p. 10)。而這種政策組裝過程也被理解為一種轉譯，但其會具體涉及多方面不同元素的交集，即兩個或多個流通中的知識，透過自我轉變來互相包容對方，以達至妥協，得以共存，這政策轉譯可能會產生一些全新的東西 (Prince, 2010, p. 173)。此外，地理學對政策空間流動的理解比政策移植／擴散所設定的來得複雜。除了單向的點對點，也可以是多向、多個中間停留點 (即受間接影響)，甚至可以是來回雙向流動的 (即相互影響) (Porto de Oliveira, 2021)。

實務界的經驗反映也呼應了政策組裝的觀點。Freeman (2007) 發現政策實務者的政策學習模式常傾向一種如同中文講的「拿來主義」。政策學習常常類似拼湊雜工匠 (bricoleur) 做事的方法一樣，他們並非理性科學家或工程師，按部就班線性地處理問題／學習。拼湊雜工匠像撿破爛般，收集儲存一堆零件與工具，不知道有什麼用途、什麼時候會用到。當遇到問題時，就看看手上有什麼東西，就用什麼東西拼湊解決 (piecing together)，政策學習就如同一種拼湊工作 (bricolage)。

政策轉譯、政策組裝、拼湊皆是一些貼近實況的跨國政策學習概念，補正政策移植與擴散的疏漏。更重要的是，這些概念才是處理學習過程本身。對政策移植與擴散有深入剖析的著名政策學者 Diane Stone (2012, 2017)，其對 21 世紀出現的新觀點進行歸納，採用了轉譯概念及地理學的洞見，對政策移植過程中產生的變異，以「學習」作為其背後的關鍵解釋。Stone (2012) 更明確指出，政策學習不等同政策採用 (policy adoption)。

此外，她認為政策轉譯比政策移植更能反映現實。政策轉譯涉及多元與多變的過程，除了擴散／移植，還包含 1) 組裝／拼湊；2) 流動 (mobilities)／變異

(mutation)；3) 解讀／在地化；4) 試錯 (trial and error)。因此學習的結果除擴散／移植所重視的趨同 (convergence) 外，也可以是政策分歧 (divergence)、二元併合 (hybridization)、調適 (adaption) 及變異 (Stone, 2017)。

再者，Stone (2004) 延伸了 Evans 與 Davis (1999) 提出的軟性移植 (soft transfer) 概念，認為政策移植研究大多討論移植政策工具、制度和具體實踐，即硬性移植 (hard transfer)，而忽視了學習者所從事的觀念、資訊與規範等軟性移植，且這是非政府行動者的廣泛行徑。就此，Stone (2012) 更認為這種知識性的移植 (knowledge transfer) 可能比政策移植更為廣泛而重要。

以上西方對政策移植與擴散理論的反思解釋了我國「借鑒」與「參考」外國經驗很多真相：跨國政策學習不必然是移植特定的政策，頂多就是知識性的移植，通俗地說就是獲取與解讀國外的政策知識或資訊，並對政策知識／資訊進行轉化，之後的運用是可以十分多樣與複雜，但必然涉及「轉譯」。如果有所行動，可能會對知識／資訊重新「組裝」，甚至將不同來源 (國內外) 的知識／資訊做「拼湊」。如果我們仍囿於傳統政策移植與擴散的框架，將無法有效理解與判斷現實當中的政策學習。

誠然，上述的西方反思仍然是在政策移植與擴散的命題下進行，並沒有擺脫供應導向的窠臼。西方政策轉譯與組裝的分析途徑皆聚焦在如何對外國輸出的政策進行重構，即先有現成政策，然後等待他國學習，最後產生變異。這模式在全球化下的確可能是最大宗，但不能代表所有個案。更甚者，這種供應導向的視野，由於從政策輸出國的角度出發，可能會使我們的理解與判斷有所偏向。如果我們從需求導向角度檢視問題，可能會得出不同的解釋與結論。這正是我們可以開發的處女地。

當然，要開發這處女地，我們必須先打開「學習的黑箱」才能理解複雜的政策學習過程。雖然西方一早已開啟政策學習領域，但有系統地建構學習模式的框架卻晚至 2010 年代。當中，Claire Dunlop 與 Claudio Radaelli (2013, p. 599) 提出的理論最具有代表性。他們貫穿了不同面向的政策學習，提出對學習的通則性定義——「基於留存或明證的經驗、分析或社會互動所帶來的信仰更新 (updating of beliefs)」。這種以「信仰更新」來理解政策學習是更具涵蓋性，不會侷限在行動導向的學習，不會將「學習的產出」等同學習本身 (Dunlop & Radaelli, 2013, p. 600)。更重要的是，他們將學習視為「過程」，一個「知識運用」(knowledge utilization) 的過程，這更能容許運用後的各種可能性，政策移植只是其中之一。

Dunlop 與 Radaelli (2013) 的主要貢獻是系統化政策學習的面向。他們首先以

政策議題的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高低 (稱為 *problem tractability*)，以及各類政策行動者來建立學習的種類 (*genera*) (共 4 類)。² 政策行動者依其權威性 (*authority*) 與正當性 (*legitimacy*) 可區分為：一般民眾、知識社群 (*epistemic community*)、政治家、官僚。

第二，他們設定學習場景的兩個角色：學習者與老師。其認為學習模式會受到學習者對學習過程的控制幅度所影響，而老師會左右這幅度。而控制的面向也分成兩個層次：1) 學習者對學習目標或目的之控制幅度；2) 學習者對學習內容或手段之控制幅度。在學習者對目標與內容具有高度控制之情況下，學習者就能進行自我引導學習 (*self-directed learning*)；在對目標高度控制，但對內容低度控制之情況下，學習者僅能進行非正規學習 (*non-formal learning*)，即學習者掌握為何而學，但其會受制於老師給予的內容或政策工具；在對目標低度控制，但對內容高度控制之情況下，學習者也只能進行非正式學習 (*informal learning*)，學習者掌握學習的內容或工具，但為何而學則受控於老師；最後，在對目標與內容皆低度控制之情況下，學習者就變成進行正式學習 (*formal learning*)，學習者完全受制於老師的引導 (Dunlop & Radaelli, 2013)。

以上的概念與架構對跨國政策學習相當具啟發性。首先，學術上一早就辨識出知識社群是面對複雜政策問題下左右政策方向的重要行動者 (Haas, 1992)，Dunlop 與 Radaelli (2013) 就理解其為主要擔任老師的角色。在跨國政策學習的情境中，知識社群明顯常擔任知識的中介，輸入與詮釋國外的資訊與知識。不過，其他的行動者也在輸入與詮釋資訊與知識，縱然不及知識社群的專注與權威性，但他們的理解與支持也賦予輸入知識的正當性。在民主體制下，非專家的政策利害相關者 (*stakeholders*) 如何詮釋政策知識是政策成功的關鍵 (Park et al., 2014)。

第二，我們也可以設定國家 (非個人) 為學習的分析單位。引用上述學習者學習控制幅度類型，當國家的跨國政策學習不太受國外老師 (指國外政府與專家，或國際組織) 所影響，甚至不存在國外老師時，就可以理解為一種「自我引導學習」的狀態 (縱然國內存在專家學者可作為老師)。另一極端就是，國外老師影響力很大，甚至完全控制學習者的學習目的與內容，這就可能出現「正式學習」。對比本文提出的需求與供應導向學習，前者會傾向需求導向學習，後者會傾向供應導向，

² 這 4 個種類包括：反思性學習 (*reflexive learning*)、知識性學習 (*epistemic learning*)、討價還價式學習 (*learning through bargaining*)、科層架構陰影下的學習 (*learning in the shadow of hierarchy*)。

並反映在政策移植／擴散中的學習情況。當然，也會出現上述提及中間情況：非正規學習與非正式學習。

第三，議題的不確定性程度是一個具啟發性的概念。學習者一般不會是腦袋一片空白地進行學習，他們在接受新資訊前腦袋已充斥著過去所獲取累積的資訊或經驗。因此，他們對問題的不確性程度會因議題與自身主觀判斷而有所差異。他們不確定的可以是目的，也可以是手段。他們也可以帶著自訂的問題框架、定見、目標來搜尋國外可匹配的標的物（包括觀念、制度、工具）來填補自己的缺口，缺口可大可小。政策學習一般是既存東西與外來（新）東西的對撞與結合。

最後，如果政策學習是一個程序的話，這程序可包含什麼？從政策移植角度看，Wolman 與 Page（2002）認為政策學習過程包含資訊傳播（communications）、處理（processing）、評估（assessing）與運用（utilizing）。由於是供應導向的思維，所以政策資訊是由政策輸出者傳播出來。從需求面出發，Heikkila 與 Gerlak（2013）提出一個較為以學習者為中心的學習程序。這過程首先從獲取（acquisition）資訊（含知識與經驗）開始，繼而評估或轉譯（translation）這些資訊，最後將知識、資訊與經驗散播（dissemination）出去。

綜合兩者的看法，如果較從需求面出發，政策學習程序應從資訊「獲取」或「蒐集」開始；繼而進行資訊的「處理」，「處理」可以包含對資訊進行加工，並涉及對資訊的詮釋／解讀及評估，這就是「轉譯」過程；最後我們不應忽視學習之結果，所以會納入「運用」，即是對轉譯後的資訊的回應，這回應可以包含政策移植、對原有政策之調適、政策組裝、負面教訓汲取、不學習（即認為沒有任何可資運用的知識）等。此外，政策學習程序之前提也會涉及對政策議題不確定性程度或範圍，以及學習者如何對政策問題框構（framing），兩者皆會影響政策資訊的蒐集範圍與轉譯的方向。

肆、被忽略的研究議程與我國跨國政策學習面臨的挑戰

至此，我們應可引伸出一系列可列入研究議程的新議題。這些議題絕大部分在我國研究文獻中仍然被忽略，若從需求面出發，更可補充國外供應導向研究之不足。這些新議題部分會在本專刊收錄的論文中開始處理。就如同本專刊背後工作坊的主題所彰顯的，「如何學習」可說是貫穿這些新議題的主軸線。這過程性的軸線可聯繫到：1）學習參與者之類型及其學習態度與其取向之問題；2）學習模式問

題；3) 學習方法問題；4) 學習效果及其產生的結果問題。

首先，「誰學習」是 Bennett 與 Howlett (1992) 一早就提出的變項，但我國相關研究甚少以學習參與者作為主題標的進行分析。例如，在國外相關研究中，知識社群對政策學習之影響力是其中一項命題，因為他們是重要的政策知識製造者、中介及傳播者 (Dunlop, 2017a; Löblová, 2018)。我國的專家學者對政策學習也一直扮演樞紐角色，但竟然沒有注專這方面的議題研究，僅有一些間接的反映。³ 至於其他的參與者，特別是我們的「當然」參與者—官僚，在我國學術討論上也是缺席的。用參與者類別來區分學習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各類參與者的權威性與正當性不同，且涉及他們的學習取向之不同，繼而影響到學習之過程與效果。

第二，學習模式指涉政策學習的基本形態。首先是上述 Dunlop 與 Radaelli (2013) 提出的政策學習系統的種類與場景。當中，由於我國長期受到國際孤立，加上存在頗多的特殊體制（如我國的五權體制），國外老師缺席經常是我們的學習情境，因此自我引導學習是值得關注的模式，而國外並沒有相關的實證研究。此外，政策學習是溝通過程，學習者如何與政策輸出者／資訊提供者溝通是跨國政策學習之關鍵；這學習也涉及政策領袖與國內政策利害相關者之溝通。而這溝通可能出現單向或雙向的溝通，單向者即學習者與政策輸出者／資訊提供者之間欠缺互動，前者只單向蒐集政策資訊，自行解讀，可能會出現扭曲現象。而政策領袖與政策利害相關者之間也會出現單或雙向的溝通，單向者即政策領袖只提供利害相關者資訊，甚至只做政策宣導，欠缺與他們互動，更不用說涉入他們於政策過程。不論是單向，還是雙向，這溝通過程就在進行政策轉譯 (Park et al, 2014)。承上述的自我引導學習，這模式就有可能導致與政策輸出者的單向溝通，出現學習扭曲現象。

第三，學習方法指涉具體的學習資訊提供／蒐集與加工處理之做法與工具。我國的跨國政策學習就常以翻譯國外官方資料、出國考察與研究委託案等方式進行資訊蒐集。李仲彬 (2021, 2024) 近年就透過官方文件分析整理出我國政府機關在政策學習上的學習對象選取的樣態。不過，學習方法部分仍有很多被忽視的地方。首先，除了對象選擇外，我們還須細緻地看學習資訊蒐集方式的恰當性與品質。例如重視空間分析的地理學會聚焦於一些蒐集資訊的特定場景與空間做分析，包括政策

³ 例如賴怡樺相關我國數學教育改革中從美國引進建構性數學教學方法的失敗經驗研究，就特別提及到專家學者的角色 (Lai, 2024)。

觀光 (policy tourism) (類似上述我國的出國考察) 及各類國際會議 (Wood, 2014; Glaser & te Brömmelstroet, 2022), 探討這些場合能否促進學習與政策採用。另一個被忽視的問題是對資訊的加工處理。這涉及對資訊的詮釋／解讀及評估, 還有與不同 (國內) 利害相關者的資訊溝通審議, 即政策轉譯過程。這轉譯過程會促進對問題的重新思考, 也會有不同的行動者參與協商, 產生新的知識 (Hassenteufel & Zeigermann, 2021)。

第四, 就學習成效與結果, 正如上述所揭示, 政策學習不一定指向政策移植的選擇。本專刊 4 篇論文的研究個案嚴格上都沒有涉及政策移植, 最多就是軟性移植, 即 Stone (2012) 提出的知識性移植。政策轉譯與組裝是更為貼切的概念來描述學習的過程與結果。Rose (1991) 的「啟發」可說這種知識性移植在我國常見的實況。誠然, 我們必需要問: 我們真的有學習嗎? 機關蒐集大量的國外政策資訊, 究竟有多大程度被利用呢? 若沒有被利用或恰當地利用, 這種「不學習」(non-learning) 或誤導性學習 (misdirected learning) 就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O'Donovan, 2017; Leong & Howlett, 2022)。最後, 不論有沒有進行學習, 這與政策成敗之間的關係已在國外有所研究, 而我國研究尚在缺位當中 (O'Donovan, 2017; Dunlop, 2017b; Leong & Howlett, 2022)。

上述討論已透露了大部分我國跨國政策學習所面臨的實況與挑戰, 以下會根據長期觀察與一些研究, 整理出一些具體議題供有興趣的研究者延伸探索: 1) 政策轉譯的問題; 2) 官僚學習的缺失; 3) 學習溝通的問題。

一、政策轉譯問題

如上所述, 跨國政策學習是我國之常態, 但同時對學習國外政策經驗上都一直有所顧慮, 特別是政策移植當中的變異問題。我們常以「橘逾淮為枳」來形容這顧慮。雖然這成語只是說明一項廣泛出現之客觀現象, 就是同樣的事物會因為所處的環境不同而發生改變, 但在比喻政策學習時, 常會將「橘逾淮為枳」視為不良的政策變異, 從國外移植來的政策無法達到原政策設計的用意, 或國外政策會受到國內因素所扭曲。

然而, 「政策轉譯」視野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觀點。「橘逾淮為枳」不必然是壞事, 卻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現象。「橘逾淮為枳」並非告訴我們不應向國外取經, 也非告訴我們好的學習必須是「橘逾淮仍為橘」。日本明治維新可說是政策轉譯成功的典範, 被認為是既有仿效 (imitation), 也有創新 (Westney, 1987)。就算西方

制度移植到日本也是「橘逾淮為枳」，但並不影響對其政策學習之評價。

因此，關鍵是我們必須從非意欲的「橘逾淮為枳」之事後發現，轉向前瞻有意識地操作「政策轉譯」，使學習成果更符合我們的需求，也能適應在地脈絡。要做到這一點，我們在跨國政策學習過程中，必須深入瞭解他國與我國之政策脈絡，瞭解國外政策成功的因果關係。明治維新的學習成就是經過很多學習者的第一手研究，以及國外老師的指導而成（Westney, 1987）。

無論如何，從政策轉譯與地理學的分析角度，政策的空間移轉就是將學習標的物從原地去鑲嵌（de-embedding），再回到本國再鑲嵌（re-embedding）之過程（Mukhtarov, 2014），政策本來就有可能在這過程中變得面目全非。於此，重點並不是避免「橘逾淮為枳」，而是剖析「政策轉譯」機制，並由此改善轉譯工作。這部分的分析仍有待開發。而所謂轉譯根本上就是要討論（應）如何學習之問題（Stone, 2012）。

二、官僚學習的缺失

承上，一直以來，政府官僚在我國跨國政策學習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官僚在「如何學習」上頗令人憂慮。其中一個原因是，官僚相當依賴文字資料的蒐集（翻譯）進行學習，學習上處於一種單向溝通模式，即學習者純粹從蒐集到的資料中自主判讀外國經驗，沒有或甚少跟學習對象作互動溝通。這種學習方法很容易造成扭曲性的政策傳譯（distorted policy translation）（Park et al., 2014），甚至出現誤導性學習。

依觀察與研究，這種單向溝通模式所產生的具體學習問題包括如下（蘇偉業，2024）：

1. 法條主義與形式制度傾向：官僚的政策學習僅聚焦在國外相關政策的法規蒐集與形式制度（formal institution）之理解，忽視制度之實質操作或實質制度（substantive institution），或遺漏了法規以外之制度安排。如我國在制定文官中立制度時，對西敏寺式（Westminster）制度的匿名性機制（anonymity）一無所知，正是因為該機制並沒有寫在法規條文中（蘇偉業，2012）。
2. 重視橫向現況，忽視縱向脈絡：官僚的政策學習僅聚焦政策或制度現況，忽視學習對象相關政策／制度的歷史發展及其制度系絡（context）；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使政策學習缺乏一個深度的視野，漠視與制度相關的外在因素或

因果關係。

3. 自我中心的解讀：傾向以自己的概念框架解讀他國的不同概念，導致理解扭曲。例如我國官僚會將英國的「非部會公共組織」（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 以下簡稱 NDPB）理解為行政法人（蔡承芳，2016）。但在習慣法地區根本沒有行政法人概念或體制，NDPB 不能與我國行政法人相提並論（本專刊李天申的論文會論及）。
4. 對應性缺位迷思：從其他國家尋找解決自身問題的方案時，往往會尋找他國的對應物（counterpart）。但由於各國概念或概念框架不同，加上我國有不少特殊制度，常會誤判或認為國外沒有對應物而放棄向外國學習，出現「不學習」現象，但現實並非如此。例如我國人事行政上的「商調」措施，在字面上就可能難以找到國外對應物，但國外可能也有類似作法而不自知。就算國外真的沒有對應物，並不代表沒有可參考的經驗。例如除了東亞國家，其他國家並沒有採用戶籍制度作為人口管理之工具，但其他國家的人口管理相關措施仍可提供解決「人籍不合一」問題之關鍵啟示（So & Ho, 2025）。

簡略而言，由於能力與時間所限，官僚政策學習傾向撿現成可直接採用的法規與制度，常以國內認知框架理解他國的制度經驗，缺乏對其他國家經驗的深度理解。

三、學習溝通的問題

學習是一個溝通過程，這個溝通包含資訊與知識的傳播，如果溝通失效或被扭曲，往往會造成不良的學習。上述官僚學習的缺失部分是導因於資料獲取上的管道問題。政府機關常利用外交部駐外館處人員協助蒐集及翻譯外國政策或制度資料，這明顯是一個不專業的做法。這不僅侷限於單向溝通學習，更重要是資料的品質堪憂。

由於我們非常依賴翻譯文獻資料進行政策學習，如果上述的資料翻譯有所偏誤，或因譯文與原文對應不佳，出現理解落差，就會影響學習溝通。王品（2019）過去針對長期照顧保險的政策學習，就發現我國就德國相關制度的中文知識與國際英文知識有顯著差異，使國人對德國制度有所誤解。

基於我國長期的國際外交孤立，國外政府組織與國際組織甚少涉入我國跨國政策學習，扮演老師的角色，使很多的政策學習處於「自我引導學習」的境況。就算

政府機關也有安排出國考察參訪，但短期性的交流學習難有深度理解。官方考察報告仍流於將獲取到的書面資料做彙整，一些考察者獲取到的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難以保存。因此官方學習難以建立雙向溝通學習或雙向溝通有限。

專家學者的研究變成上述困境之突破方式，透過他們的長期研究投入及知識傳播，讓政府官員與國人較可能理解國外的政策與制度。若他們投入政策倡導，也產生政策移植的作用。不過，在國外老師缺位之情況下，國內老師也享有過多的對國外政策知識的詮釋權，少數權威更可能控制政策轉譯。賴怡樺（Lai, 2024）針對我國過去從美國引進建構式數學教學的政策移植失敗個案研究，就導出個別國內專家學者主導政策學習所產生的問題。無論如何，專家學者的介入並沒有改善欠缺雙向溝通學習的困境。誠然，知識社群在政策學習之影響程度仍然有很多不確定因素或多樣性，值得進一步探索。本專刊之論文將反映這一點。

伍、專刊論文的多面向

本專刊收錄的 4 篇研究論文皆回應了上文所舉議題之部分面向。這 4 篇個案研究分別討論我國行政法人的制度建立、日本與我國地方創生差異比較、我國公園遊戲場改造的政策學習與公私共創，以及我國都市樹木管理制度發展的政策學習。這些論文涵蓋很多政策學習相關而國內甚少使用的概念或命題，包括官僚的不學習、Rose（1991）的啟發、軟性移植、政策轉譯、政策組裝，也隱含涉及知識社群的角色。

李天申撰寫相關我國行政法人制度建立中的跨國政策學習導出了幾個有趣的政策學習現象。當我國行政法人概念的確源於國外時，國外經驗之實質影響力幾乎是零。這涉及負責起草「行政法人法」的人事官僚之主導角色。他們面臨學習資訊不足的問題，因此不太瞭解國外相關的改革趨勢，最終沒有學習或參考其他國家的制度。正如作者指出，與行政法人相關在國外風靡一時「代理機構化」改革在國內的討論竟然是一片空白。行政法人的制度建立基本上是依據自訂的改革議程，不是國外的政策擴散，雖有透過專家學者嘗試攝取國外的制度元素，但最終專家學者之影響力不大，行政法人制度更多是參考國內已存制度來設計。因此，從跨國政策學習角度看，這是一個欠缺知情學習下的制度設計，是一個「不學習」的案例，或僅存在一些軟性移植。這個案正好對應上文提出的需求導向的自我引導學習模式，同時反映上述官僚政策學習之缺失。

如果行政法人與代理機構化連名稱都搭不上關係的話，那麼一般人都能耳熟的「地方創生」則可說是明確從日本擴散到我國的地方振興計畫，因應人口老化，挽救偏鄉地方人口流失所造成的社會經濟問題。不過，與行政法人的個案類似，黃志隆的研究顯示日本與我國的地方創生除了名稱相同外，兩者基本上有各自的政策議程，依據自身原有的地方振興策略延伸地方創生，自我學習，因此兩者各有取向，政策工具毫無交集。因此日本對我國的地方創生之影響更像是一種 Rose (1991) 所指啟發作用，我們最多是進行軟性移植。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與我國啟動地方創生的時間相隔不遠，這政策學習經驗指出了 Rose (1991) 的教訓汲取的盲點，即教訓汲取認為我們應從成功經驗中尋找改革捷徑，但我們很難說日本的地方創生已經成功。日本與我國的地方創生更像是一種共同並進的改革試驗，現實是我們不會等待別人成功才會進行學習，我們也常難以斷定他國的政策試驗成敗。

如果官僚學習存在缺失與侷限，那麼是否由民間人士進行學習更有利於政策知識之傳播？傅凱若的民間「還我特色公園聯盟」（簡稱「特公盟」）個案研究支持了這看法。特公盟是我國推動公園遊戲場改造的民間組織，組織成員包括了一些有國外生活或留學經驗的媽媽，她們將國外公園遊戲改造的做法帶回國內，向政府進行政策倡議。而特公盟所倡議的並不是簡單將國外做法直接移植，而是經過政策轉譯，將國外政策知識進行轉化，以符本土的需求。此外，他們也與國外相關公園遊戲改革的倡議者建立聯繫，進行學習交流，吸收新知。由於特公盟成員是議題的主動關注者，也是使用者，且有更多的親身經歷與國際交流，這比官僚側重「書面資料」與「法規」的學習更為透徹。不過，由於民間組織沒有公權力，無法執行政策計畫，所以他們仍要與政府機關合作，進行共創（co-creation）。同時，為使有效倡議，也須與其他國內利害相關者聯繫溝通，獲取支持，並進行民主政策轉譯（democratic policy translation）。因此，特公盟的個案不僅反映民間組織作為學習中介的優勢，同時也驗證了雙向溝通學習是政策成功的關鍵。這更隱含了知識社群的分析不應只侷限在專家學者之間，也可以包含一些民間倡議團體。

黃愷茹的個案研究更進一步揭示，政策學習可以是一個經年累月跨時代的演化過程。我國都市的林木管理制度建立可追溯到 1980 年代，迄今體制仍在建立當中。由於我國對相關林木管理的知識經驗不足，因此我們一直不斷吸收來自不同國家的相關知識與制度，以處理本土問題。作者的研究提出，在這漫長的學習過程中，不單要進行在地化的政策轉譯，更要進行政策組裝，將不同的國內外元素組合。就此，本個案提出兩個組裝過程：1) 知識組裝；2) 制度組裝。前者是指

2015 年修正《森林法》，建立都市樹木保護的法源前，政府研究機構對相關林木保護管理的知識建構；後者是指修法後，建立林木管理的標準化制度。該文導出了，我國的特殊制度脈絡如何影響政策學習。縱然國外已存在成熟的制度可供移植，但仍必須改裝自建相關制度，並面臨頗多的障礙。本個案研究除涉及政府機關外，也涉入專家學者（含政府研究機構中的）、民間組織、業界組織及國外專家，展現跨國政策學習的複雜圖像。而該文則能有系統地闡述這長時間且複雜的過程。

此外，上述 4 篇文章之個案並沒有觸及政策學習與政策失敗之關係，但本專刊邀請了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博士生張巧函針對 Dunlop (2020) 編輯的一本論文集撰寫書評。該論文集聚焦在政策學習與政策失敗之間的各種關係，透過西方國家的經驗研究，探索這議題的各個面向。這議題告訴我們政策學習不必然帶來成功（如上文提及的我們可以「將不成功的經驗成功移植」）。而就算面對政策失敗，我們又能否及應如何汲取教訓？這都指向「如何學習」這關鍵。該論文集提供研究者一些就政策學習的不同洞見。

最後，冀盼本專論及專刊的各文章可為今後我國跨國政策學習研究開拓新的視野，為相關研究再啟航起拋磚引玉的作用。

參考文獻

- 王品 (2019)。「跨國學習政策」中文與英文知識建構比較：以德國長期照顧保險為例 (1995~201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31 (3), 339-384。[Wang, P. (2019). Cross-country policy-learning as knowledge-making: Comparing literature printed in Chinese and English about the German long-term care insurance (1995-2017).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Philosophy*, 31(3), 339-384.]
- 李仲彬 (2021)。**政府資訊行為：政策學習研究的遺失環節**。五南。[Lee, C.-P. (2021). *Government information behavior: A missing link of policy learning study*. Wu-Nan Book Inc.]
- 李仲彬 (2024)。**我國政策學習對象選擇機制之探討**。**東吳政治學報**, 42 (2), 65-139。[Lee, C.-P. (2024). A study on the selection mechanism of policy learning objects in Taiwan.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2(2), 65-139.]
- 吳定 (1998)。**自政策學習觀點論政府再造之推動－政府再造最佳途徑，在推動良**

- 好的政策學習系統。考銓季刊，（16），49-61。[Wu, T. (1998). Zi zhengce xuexi guandian lun zhengfuzazao zhi tuidong - Zhengfuzazao zuijia tujing, zai tuidong lianghaode zhengcexuexi xitong. *Examination & Personnel Quarterly*, (16), 49-61.]
- 陳明敏、陳玟伶、李長明、賴湘如（2017）。我國戶籍遷徙登記制度之研析——人籍不合一之問題與策進（編號：106-000000AU61-0001）。內政部戶政司。[Chen, M.-M., Chen, W.-L., Li, C.-M., & Lai, H.-J. (2017). *Woguo huji qianxi dengji zhidu zhi yanxi - Renji bu heyi zhi wenti yu cejin* (Project number: 106-000000AU61-0001). Department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 蔡承芳（2016）。英國及日本行政法人績效評鑑制度簡介。人事月刊，（368），61-71。[Tsai, C.-F. (2016). Yingguo ji riben xingzhengfaren jixiao pingjian zhidu jianjie. *Personnel Monthly*, (368), 61-71.]
- 蘇偉業（2012）。南轅北轍的議題與路徑：政治轉型下台灣與香港文官中立機制之比較。公共行政學報，（43），35-62。[So, B. W. Y. (2012). Divergent agenda and sett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ivil service neutrality between Taiwan and Hong Kong under political transit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3), 35-62.]
- 蘇偉業（2017）。西方模型移植還是扭曲性傳譯？中國行政改革的政策學習過程。中國大陸研究，60（4），1-24。[So, B. W. Y. (2017). Transfer to western model or distorted translation? The policy learning process of administrative reforms in China. *Mainland China Studies*, 60(4), 1-24.]
- 蘇偉業（2024）。韓國政府施政績效管理制度研析（編號：PG11212-0112）。國家發展委員會。[So, B. W. Y. (2024). *Hanguo zhengfu shizheng jixiao guanli zhidu yanxi* (Project number: PG11212-0112). National Development Council.]
- Bennett, C. J., & Howlett, M. (1992). The lessons of learning: Reconciling theories of policy learning and policy change. *Policy Sciences*, 25(3), 275-294.
- Cook, I. R., & Ward, K. (2011). Trans-urban networks of learning, mega events and policy tourism: The case of Manchester's Commonwealth and Olympic games projects. *Urban Studies*, 48(12), 2519-2535.
- Dolowitz, D. P. (2009). Learning by observing: Surveying the international arena. *Policy & Politics*, 37(3), 317-334.
- Dolowitz, D. P., & Marsh, D. (1996). Who learns what from whom? A review of the policy transfer literature. *Political Studies*, 44(2), 343-357.
- Dolowitz, D. P., & Marsh, D. (2000). Learning from abroad: The role of policy transfer in

- contemporary policy-making. *Governance*, 13(1), 5-24.
- Dunlop, C. A. (2017a). The irony of epistemic learning: Epistemic communities, policy learning and the case of Europe's hormones saga. *Policy and Society*, 36(2), 215-232.
- Dunlop, C. A. (2017b). Policy learning and policy failure: Definitions, dimensions and intersections. *Policy & Politics*, 45(1), 3-18.
- Dunlop, C. A. (Ed.) (2020). *Policy learning and policy failure*. Policy Press.
- Dunlop, C. A., & Radaelli, C. M. (2013). Systematising policy learning: From monolith to dimensions. *Political Studies*, 61(3), 599-619.
- Evans, M. (2004). Introduction: Is policy transfer rational policy-making? In M. Evans (Ed.), *Policy transfer in global perspective* (1st ed., pp. 1-9). Ashgate.
- Evans, M. (2009). Policy transfer in critical perspective. *Policy Studies*, 30(3), 243-268.
- Evans, M., & Davis, J. (1999). Understanding policy transfer: A multi-level,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77(2), 361-385.
- Eyestone, R. (1977). Confusion, diffusion and innov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2), 441-447.
- Freeman, R. (2006). Learning in public policy. In M. Moran, M. Rein, & R. E. Goodi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pp. 367-38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reeman, R. (2007). Epistemological bricolage: How practitioners make sense of learning.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39(4), 476-496.
- Fu, K.-J. (2023). Translating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to an administrative system: The case of Taipei City.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16(3), 312-331.
- Glaser, M., & te Brömmelstroet, M. (2022). Unpacking policy transfer as a situated practice: Blending social, spatial, and sensory learning at a conference. *Applied Mobilities*, 7(2), 163-185.
- Haas, P. M. (1992).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1), 1-35.
- Hasan, S., Evers, J., & Zwarteveen, M. (2020). The transfer of Dutch Delta planning expertise to Bangladesh: A process of policy translation.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104, 161-173.
- Hassenteufel, P., & Zeigermann, U. (2021).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ors in policy transfer processes. In O. Porto de Oliveira (Ed.), *Handbook of policy transfer, diffusion and circulation* (pp. 58-79). Edward Elgar.
- Hecl, H. (1974). *Modern social politics in Britain and Sweden: From relief to income*

- maintenan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ikkila, T., & Gerlak, A. K. (2013). Building a conceptual approach to collective learning: Lessons for public policy scholars.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1(3), 484-512.
- Johnson, B., & Hagström, B. (2005). The translation perspective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policy diffusion paradigm: The case of the Swedish methadone maintenance treatment. *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4(3), 365-388.
- Kuhlmann, J. (2021). Mechanisms of policy transfer and policy diffusion. In O. Porto de Oliveira (Ed.), *Handbook of policy transfer, diffusion and circulation* (pp. 43-57). Edward Elgar.
- Lai, Y.-H. (2024). Education reform through westernization in Taiwan: A case of transferring the constructivist-based mathematics curriculu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17(1), 123-141.
- Latour, B. (1986). The power of association. In J. Law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pp. 265-280). Routledge & Kegan Paul.
- Lendvai, N., & Stubbs, P. (2007). Policies as translation: Situating transnational social policies." In S. M. Hodgson & Z. Irving (Eds.), *Policy reconsidered: Meanings, politics and practices*, (pp. 173-189). Policy Press.
- Leong, C., & Howlett, M. (2022). Policy learning, policy failure, and the mitigation of policy risks: Re-thinking the lessons of policy success and failure. *Administration & Society*, 54(7), 1379-1401.
- Löblová, O. (2018). When epistemic communities fail: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of policy influence. *Policy Studies Journal*, 46(1), 160-189.
- Low, J. (2023). 'Singapore-West' hybridization: policy learn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leadership training in the Singapore Public Service. *Journal of Asian Public Policy*, 16(3), 426-441.
- Marsh, D., & Sharman, J. C. (2009). Policy diffusion and policy transfer. *Policy Studies*, 30(3), 269-288.
- May, P. J. (1992). Policy learning and failur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2(4), 331-354.
- McCann, E. (2008). Expertise, truth, and urban policy mobilities: Global circuits of knowled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Vancouver, Canada's 'four pillar' drug strateg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0(4), 885-904.
- McCann, E. (2011). Urban policy mobilities and global circuits of knowledge: Toward a research agend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1(1), 107-130.
- McCann, E., & Ward, K. (2013).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policy transfer research:

- Geographies, assemblages, mobilities and mutations. *Policy Studies*, 34(1), 2-18.
- Meseguer, C. (2005). Policy learning, policy diffusion,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ord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98(1), 67-82.
- Minkman, E., & van Buuren, A. (2019). Branding in policy translation: How the Dutch Delta approach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br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icy*, 96, 114-122.
- Mukhtarov, F. (2014). Rethinking the travel of ideas: Policy translation in the water sector. *Policy & Politics*, 42(1), 71-88.
- O'Donovan, K. (2017). Policy failure and policy learning: Examining the conditions of learning after disaster.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34(4), 537-558.
- Park, C., Wilding, M., & Chung, C. (2014). The importance of feedback: Policy transfer, translation and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 *Policy Studies*, 35(4), 397-412.
- Peck, J. (2011). Geographies of policy: From transfer-diffusion to mobility-mut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5(6), 773-797.
- Porto de Oliveira, O. (2021). A prelude to policy transfer research. In O. Porto de Oliveira (Ed.), *Handbook of policy transfer, diffusion and circulation* (pp. 1-24). Edward.
- Prince, R. (2010). Policy transfer as policy assemblage: Making policy for the creative industries in New Zealand.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2(1), 169-186.
- Rose, R. (1991). What is lesson-drawing?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11(1), 3-30.
- Rose, R. (1993). *Lesson-drawing in public policy: A guide to learning across time and space*.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 Rose, R. (2005). *Learning from comparative public policy: A practical guide*. Routledge.
- So, B. W., & Ho, L. K. (2025). Conversion and drift of traditional institutions under democratization: Case of the 'evolve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in Taiw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 Studies*. (published online). <https://doi.org/10.1080/24761028.2025.2593498>
- Stone, D. (2004). Transfer agents and global networks in 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policy.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11(3), 545-566.
- Stone, D. (2012). Transfer and translation of policy. *Policy Studies*, 33(6), 483-499.
- Stone, D. (2017).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er of policy failure: Bricolage, experimentalism and translation. *Policy & Politics*, 45(1), 55-70.
- Walker, J. L. (1969).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3), 880-899.
- Westney, D. E. (1987). *Imit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transfer of western organizational patterns of Meiji Japa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Weyland, K. (Ed.). (2004). *Learning from foreign models in Latin American policy reform*.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Wolman, H. (1992). Understanding cross national policy transfers: The case of Britain and the US. *Governance*, 5(1), 27-45.
- Wolman, H., & Page, E. (2002). Policy transfer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An information - theory approach. *Governance*, 15(4), 477-501.
- Wood, A. (2014). Learning through policy tourism: Circulating bus rapid transit from South America to South Africa.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46(11), 2654-2669.

